

分类号 D90 密级

U D C 34 编号

厦 门 大 学
博 士 后 研 究 工 作 报 告

功利主义在近现代中国

——以边沁主义为主线

姓 名 阎 云 峰

工作完成日期 2010 年 12 月—2013 年 5 月

报告提交日期 2013 年 6 月

厦 门 大 学

2013 年 6 月

功利主义在近现代中国

—以边沁主义为主线

UTILITARIANISM IN MORDERN CHINA —WITH THE FOCUS ON THE BENTHAMISM

博 士 后 姓 名 阎云峰

流动站（一级学科）名称 法学

专 业（二级学科）名称 法学理论

研究工作起始时间 2010年12月1日

研究工作期满时间 2013年5月30日

厦 门 大 学

2013年6月

厦门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厦门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博士后研究报告的规定。厦门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该报告的纸质版和电子版，有权将该报告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该报告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该报告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博士后研究报告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本研究报告属于： 1、保密（）， 2、不保密（）

纸本在 贰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电子版在 贰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内 容 摘 要

哲学意义上的功利论至少应具备下述三种含义中的一种。其一，人性论上的趋乐避苦或趋利避害（乐利论）；其二，视其他事物（包括道德）为追求快乐或利益目标的手段（目的论）；其三，道德评价标准上注重行为的结果（结果论）。

趋乐避苦出于感觉、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中西概莫能外，不同的是人们如何认识和对待它。西方古希腊时代晚期和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前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以及近现代，都有功利论的不同思想形态。在西方，古希腊伊壁鸠鲁哲学以快乐主义为特征。事功和逐利是普遍的，功利主义却是英国的，甚至堪称英国“国粹”或“国学”。近代形成系统功利主义，杰里米·边沁乃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是边沁式功利主义的修正者，古典功利主义理论的完整阐发者。

在传统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墨家、法家、早期道家、中国化的佛教都有功利论的某些特征，甚至儒家内部也有功利派，如南宋永嘉派与近世经世派。儒家的主流传统是以义制利，以理制欲。不过宋明以降，李贽、戴震、王夫之等思想家，在反思理学的基础上主张人欲的正当性，近世中国“人”的发现某种程度上是儒学思想内在演变的逻辑结果。然而，真正的逻辑反转确是西学冲击的直接结果，功利主义的影响首当其冲。

本文将以边沁功利主义研究在近现代中国的学术史梳理为主要切入点，联系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从中西比较和会通的角度探究这期间思想史变迁的逻辑。在笔者看来，中国思想界对功利主义的接受并非被动，功利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特定时空条件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和转化。

关键词：功利主义，边沁，中西会通，比较研究

Abstract

In the philosophical sense, Utilitarianism contains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three meanings. Firstly, as far as human nature is concerned, it holds that people have the tendency to pursue happiness and avoid pains, or seek profit but avoid harmfulness(Utility); secondly, they regard things (morality included) as mere means to achieve such end as happiness or utility(Teleology); thirdly, consequences are used as criteria for assessing one's behavior(Consequentialism).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profit) and avoidance of pains (harmfulness) derive from human sensations—they are part of human instincts—so much so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is regard. The only difference, then, lies in how one views it. Variations of utilitarian theme manifested themselves in late Greek antiquity and in the time of modern Europe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as well as in Spring-Autumn,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modern China.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pursuit of utility is universal, utilitarianism is particularly English—one might even say that it is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English culture. Jeremy Bentham brought utilitarian thoughts into a systematic whole, While J. S. Mill was just an emendator of Bentham utilitarianism, and a complete analyst of classical utilitarianism.

In traditional China, utilitarian characteristics can be found in Moism, Legalism, early Daoism, and Sinicized or localized Buddhism. Eve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nfucianism, one can detect traces of utility in, for instance, Yongjia School during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Jingshi School in modern China. Although the mainstream Confucian tradition holds that righteousness should take precedence over benefits, and li (Ritual) should be used to overcome desires, thinkers such as Li Zhi, Dai Zhen, and Wang Fuzhi living in Song and Ming dynasty nevertheless gave human desire its due, on the basis of their rather thorough reflection on School of Li (*lixue*.) Therefor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discovery of “man” in modern China can be said as the logical result of the intrinsic evolution in Confucianism. Be that as it may, the real reverse took place when the tradition had an encounter with Western thoughts, especially Utilitarianism.

The thesis takes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studies on Bentham's Utilitarianism in modern China. Against the relevant socio-historical

background,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grasp the inner logic of the transition of the utilitarian thought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uthor does not take on board the idea that China's acceptance of Utilitarianism is primarily permissive. Rather, the author holds that Utilitarianism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digestion, fusion, and transformation up to a point.

Keywords: Utilitarianism, Jeremy Bentham, Inter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comparative study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

目 次

1.导论.....	1
2.转型时代（1895-1925）的功利主义.....	4
2.1 康有为“求乐免苦”的功利观.....	4
2.2 严复的功利观.....	7
2.3 梁启超对边沁乐利学说的译介与述评.....	11
2.4 王国维的“法学客串”与边沁.....	22
2.5 刘师培对杨朱和边沁乐利学派之比较.....	24
2.6 章士钊的政治功利主义.....	27
2.7 杜亚泉与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论争与功利主义.....	35
2.8 五四时期的人生观讨论与功利主义.....	47
2.9 杨昌济在伦理学上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51
2.10 天心述评英国功利说.....	57
2.11 屠孝实评功利主义.....	61
2.12 学衡派论功利主义.....	64
3.功利主义在近现代中国（1925-1949）.....	74
3.1 汉译作品.....	74
3.1.1 罗素论边沁.....	76
3.1.2 戴卫孙论功利主义政治思想.....	79
3.1.3 波拉克论边沁及功利主义派的主权论和立法原理.....	83
3.1.4 格特尔论功利主义政治思想.....	87
3.2 研究论文.....	89
3.2.1 张东荪对快乐论的历史分析和学理批评.....	92
3.2.2 浦薛凤论功利主义政治思想.....	96
3.2.3 吴泽炎中西快乐论功利论之比较.....	102
3.2.4 李述贤论边沁的法律思想.....	107

3.2.5 朱亦松述评西方快乐主义.....	109
3.2.6 伍藻池论边沁的功利主义.....	115
3.2.7 高庆丰功利论.....	116
3.2.8 现代新儒家论功利主义：以《思想与时代》为阵地.....	118
3.2.9 中国学者的敬意：潘光旦《边沁二百年祭》.....	132
4.结论.....	137
5.附录：边沁在近现代中国（书稿）.....	141
参考文献.....	415
致 谢.....	422
博士生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424
博士后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425
个人简历.....	426
联系地址.....	427

功利主义在近现代中国

——以边沁主义为主线

自乐及人最可崇

利人愈广便为公

勿因近利抛长利

准此方成立法功

——张东荪

1. 导论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2.15-1832.6.6），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法学家、社会改革家，一生致力于立法著述和推动政治法律改革活动。其法律与政治思想对 19 世纪英国司法和民主改革影响甚巨，有“英国改革之父”的美誉。对欧洲（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俄罗斯等）、印度、美国、中南美国家的法律改革和立法也影响较大，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法学家。作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鼻祖，边沁可谓英美法律史上从自然法到实证法思想转变的关键人物。而其法哲学的理论指导原则是功利主义，因此边沁也是系统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

从 1902 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将边沁的功利主义及其法政思想正式引入中国，至今已有一百一十多年的历史。这期间中国学术界对以边沁为代表功利主义有着怎样的接纳和改造？对其法哲学又有怎样的研究和评价？

哲学意义上的功利论至少应具备下述三种含义中的一种。其一，人性论上的趋乐避苦或趋利避害（乐利论）；其二，视其他事物（包括道德）为追求快乐或利益目标的手段（目的论）；其三，道德评价标准上注重行为的结果而轻动机（结果论）。

趋乐避苦出于感觉、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中西概莫能外，不同的是人们如何认识 and 对待它。西方古希腊时代晚期和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前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以及近现代，都有功利论的不同思想形态。在西方，古希腊伊壁鸠鲁哲学以快乐主义为特征。形成系统功利主义，边沁乃集大成者。事功和逐利是普遍的，功利主义却是英国的，甚至堪称英国“国粹”或“国学”。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是边沁式功利主义的修正者，古典功利主义理论的完整阐发者。

在传统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墨家、法家、早期道家、中国化的佛教都有功利论的某些特征，甚至儒家内部也有功利派，如南宋永嘉派（陈亮、叶适等为代表）与近世经世派。墨子主张“义，利也”，其大利主义与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之处在于墨家牺牲个人的整体主义）。法家思想建立在人趋利避害和好赏恶罚的天性之上，这与边沁的法律思想亦颇多类似之处（不同在于法家刑赏是专制君主手中的工具）。早期道家杨朱主张为我，具有快乐论的特征。就快乐论而言，对中国思想影响颇大的佛教，倡导追求精神上的快乐。儒家的主流传统是以义制利，以理制欲。不过宋明以降，李贽、戴震、王夫之等思想家，在反思理学的基础上主张人欲的正当性，近世中国“人”的发现某种程度上是儒学思想内在演变的逻辑结果。^①然而，真正的逻辑反转确是西学冲击的直接结果，功利主义的影响首当其冲。

笔者按照功利论的目的逻辑，将这一百一十多年按年的思想史分为三个阶段：国家（社会）功利主义、革命功利主义和经济功利主义。也就是说，笔者试图以功利论的逻辑解释这一段思想史。该报告主要研究的是第一阶段，即近现代中国（1895-1949）的国家（社会）功利主义阶段。

本文将边沁功利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学术史梳理为主要切入点，联系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从中西比较和会通的角度（尤其是对中西功利思想）探究这期间思想史变迁的逻辑。在笔者看来，中国思想界对功利主义的接受并非被动，恰恰是中西功利论在近代中国的特定时空条件下产生了一定的融合和转化。

^① 赵明，《近代中国对“权利”概念的接纳》，载《现代法学》2002年2月，第69-75页。

笔者参照张颢先生所提出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①即1895-1925，以1925年前后为界，将本报告正文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探讨转型时代1895-1925的功利主义（以边沁主义为主线），学术史与思想史并重；后一部分探讨1925-1949这一时期边沁功利主义在中国的研究态势，偏重学术史的述评。

这个特定时空背景需要略加交代。自1840年中英战争，当传统的中国遭遇现代的西方，古老的帝国被拖入现代的世界秩序，1860年后中国在外来压力和冲击下，从被动到逐渐主动，先后在器物（洋务运动）、制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和文化方面（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进行了革新。我们所关注的学术思想变迁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① “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1925年初前后大约三十年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巨变。就前者而言，主要变化有二：一为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一为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出现。至于思想内容的变化，也有两方面：文化取向危机与新的思想论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s）。”张颢：《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7月，第134页。

2. 转型时代（1895-1925）的功利主义

2.1 康有为“求乐免苦”的功利观

康有为（1858-1927）是戊戌维新派代表人物，以儒家圣人自居。（1882年康有为途径上海，从租界十里洋场的繁荣，看到了西人治术的可取之处。）康有为继承明清功利论的成果^①，融合中西思想资源，尤其是西方的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在批驳传统“存理去欲”伦理观的基础上创立了以“求乐免苦”为宗旨的功利论伦理体系。

康有为的功利思想在《大同书》中有比较系统的阐述。据张岂之和陈国庆考证，康氏大同思想在1884年的《礼运注》中已有基本轮廓^②。而据吴根梁所述，康有为功利论思想在1886年的《民功篇》中亦见雏形^③。《大同书》成书较晚，据陈得媛和李传印所说：“康有为生前没有将《大同书》全部刊印行世，书稿写成后，秘不示人，只是对他的一些较为得意的学生进行讲说和讨论。1913年的《不忍》杂志首次刊布了《大同书》甲部《入世界观众苦》和乙部《去国界合大地》。1919年上海长兴书局将甲乙两部合刊成单行本，正式题名为《大同书》。康有为在自序中说：‘此书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今先印甲乙两部，盖已刊《不忍》，取而印之，余则尚有待也。’康有为去世八年，即1935年，康氏子弟钱定安校订全书并交上海中华书局出版。”^④

康有为主张人道以苦乐为宗旨。他说：“故夫人道只有宜与不宜，不宜者苦也，宜之又宜者乐也。故夫人道者，依人以为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故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

^① 余英时认为：“从思想史上看，清末民初出现了一批求变求新的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在西方的价值和观念方面作出了明确的选择。但这些选择并不是任意性的；明清儒学的新动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这是明清以来中国的内在渐变在近代继续发挥影响力的显证。”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59页。

^② 张岂之、陈国庆：《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版，第131页。

^③ 吴根梁：《功利主义与康有为的近代社会政治学说——〈民功篇〉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6期，第83-90页。

^④ 陈得媛、李传印：《〈大同书〉评价》，见罗炳良主编：《康有为大同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3页。

己，无他道矣。其有迂有途，假其道，曲折以赴，行苦而不厌者，亦以求乐而已。虽人之性有不同乎，而可断断言之曰：人道无求苦去乐者也。”^①康氏还认为求乐免苦是社会进化的动力。他写道：“其乐之益进无量，其苦之益觉亦无量，二者交觉而日益思为求乐免苦之计，是为进化。”^②康氏进而认为苦乐的多少是善恶的标准。他说：“立法创教，令人有乐而无苦，善之善者也；能令人乐多苦少，善而未尽善者也；令人苦多乐少，不善者也。”^③圣人因人情之所乐，顺人事之自然，立三统三世之法，去九界之苦，至极乐之境。

一直困扰着明清功利论的问题是，人的自然本性怎样转化为伦理道德，人人固有且相异的欲望又如何厘定行为的规则。张喜平认为：“康有为则从人道主义角度关照人的本性。他认为，一切人道世事，无非是为了求乐免苦，人的一切社会性活动归根到底都是去苦求乐的本性所规定的。这样，人的自然本性就具有社会性的内涵，‘是’与‘应当’有着必然的关联。人的自然属性由于具有社会性的本质，就使人与动物相揖别，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与应当的直接关联，就使人的自然属性根本区别于动物的本能，在这一基础上，康有为提出‘礼’的范畴。”^④

圣人立法创教制礼作乐，表面上看起来是中国传统式的，但理论根基却是去苦求乐，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评价说：“先生之哲学，主乐派哲学也”。张喜平认为，康氏功利观的价值在于：“开启了由道德标准上的善恶到幸福原则的突显，由生活中的成圣求善到求乐务实的转向。”^⑤康有为反对无节制的纵欲，主张“以礼节欲”。张岂之和陈国庆认为：“康有为的‘礼’，体现了资产阶级合理利己主义的伦理观念。他试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就是既要满足个人的各种欲望和要求，又不侵犯他人满足欲望的正当权益和自由，不妨害群体的利益和正常的社会秩序，使每个人的名分地位各有所宜，人人‘各得其乐’”。^⑥

萧公权认为：“康氏于此颇近边沁（Jeremy Bentham），其乐利主义是为改

^① 罗炳良主编：《康有为大同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9-10页。

^② 罗炳良主编：《康有为大同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343页。

^③ 罗炳良主编：《康有为大同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1页。

^④ 张喜平：《功利与公正》，香港：香港新闻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43页。

^⑤ 张喜平：《功利与公正》，香港：香港新闻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44页。

^⑥ 张岂之、陈国庆：《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版，第124-125页。

革的理论基础。康氏似未曾读到边沁的译著。”^①何金彝从边沁的功利主义三大原则，即快乐原则（即求福避祸原则）、仁慈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原则（效果原则）比较了康有为的伦理文化观与边沁的功利主义的异同之处和契合之点。并且认为：“早在 1902 年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过《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一文，介绍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康氏在 1923 年的西安演讲中提到“边沁的功利主义”，康有为怎能未读过边沁的译著呢？”^②

笔者认为，康有为功利思想与边沁的功利主义颇有相近之处和异曲同工之妙。首先是苦乐原则和苦乐分类法。康氏的苦乐分类与边沁相比可是有过之无不及。康氏《大同书》中的苦乐，人生之苦 7 种，天灾之苦 10 种，人道之苦 5 种，人治之苦 3 种，人情之苦 8 种，人所尊尚之苦 5 种，凡 38 种。大同之世，“九界既去，则人为诸苦尽除矣，只有乐而已”，居处、舟车、饮食、衣服、器用、净香、沐浴、医视疾病、炼形神仙以及灵魂之乐，凡十种，颇具中国特色。其次，与康氏的实现全人类极乐世界的理想相对应的，是边沁着眼现实的最大幸福原则。再者，尤为重要，康氏所主张的圣人立法（创教制礼）以节欲和调节人际关系，与边沁的通过立法实现利益的人为同一原理确有类似之处，不同的是前者道德法，后者是实在法。

^① 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台北经济出版事业公司 1988 年版，第 149-150 页。转引自何金彝：《康有为的功利主义伦理文化观》，载《社会科学》1995 年第 7 期，第 58 页。

^② 何金彝：《康有为的功利主义伦理文化观》，载《社会科学》1995 年第 7 期，第 55-59 页。

2.2 严复的功利观

严复（1854-1921），思想家、翻译家、政论家，维新派代表人物。曾留学英国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入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戊戌变法前后，严复的时论文章，以及译述赫胥黎（T.H.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进化论与伦理学 1897）和斯宾塞（H·Spencer. *Study of Sociology*. 群学肄言 1897）等人的著作，极大改变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人性、社会和历史的看法，诸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和毛泽东等人年轻时均受到严复思想的影响。而严复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和功利主义大师穆勒《群己权界论》（J.S.Mill. *On Liberty*. 1903）的译介，则直接促使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严复对西学和中学均有精深的了悟，他早已突破了张之洞“中体西用”的逻辑。他斥“中体西用”论牛头不对马嘴，“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①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主张。

严复提出自己的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时也不再像康有为一样穿着儒学的外衣^②。按照徐华茨的说法，严复所做的努力是为了寻求像西方一样的富强之道，进化论为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自由、民主等也可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种目的论意义上的功利，也是中国传统所熟悉的。然而，在严复典雅和古奥的翻译和按语中充斥着大量中国典故，以及中国哲学（儒道释）与西方现代思想间的相似性类比。吴展良检讨了至今为止的严复研究，认为不同程度地存在“被研究者主体性”的失落问题，他经过认真的研究提出了严复的深层思维方式是追求“下学而上达的一以贯之的大道”。^③笔者认为其主体性的探求值得赞赏，也确有深层次的思维方式的存在，但可能不是儒家式的具体的道，而是实用理性和一元

^①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559页。

^② “严复的同侪杰出人物康有为也曾坚持过人类社会必然进步的观念，但是他试图从儒家思想中一个受压制的派别（今文经学）中导出这些观念。严复觉得没有必要为他思想中的新观念寻找一件中国的外衣。”[美]徐华茨著：《严复与西方》，滕复等译，北京：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67页。

^③ 吴展良：《中国现代学人的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论集》，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3月版，第43页。

论的思维方式。

一、进化论功利主义

严复倡导的进化论，非达尔文的原教旨，而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严复选取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做”(鲁迅语)成《天演论》，是想以赫胥黎的“以人持天”补救斯宾塞的“任天为治”。严复在《天演论》自序中说：“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①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说，也来自斯宾塞（《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1861），可见影响之深。

斯宾塞的进化论具有功利主义的特征，在这一点上是受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影响。据刘鲁敬所述，斯宾塞的功利主义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斯宾塞认为，人是从生物进化而来，人的行为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而生物进化的过程是生物的合目的性行为逐步发达完善的过程，人类行为的合目的性比起动物行为的合目的性更充分更高级。从这一观点出发，斯宾塞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善的还是恶的，其根据就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适应目的，有利于促进进化还是不利于促进进化。善的行为就是相对进化的行为，恶的行为则是相对来说进化较小的行为。所谓幸福，即是官能力量的充分合理运用，因为这样才能够促进人的进化，官能活动不足或活动过度都不利于人的进化。给人带来快乐的行为有助于个人和整个人类的进化，因而是善的。相反，给人带来痛苦的行为则是恶的。

二、开明自营的伦理观

严复对斯密《原富》的按语表明，严复大力倡导的现代经济学和“开明自营”的功利伦理，明确针对中国旧学“讳言利之习”和“重农抑商”之故见而发。但遗憾的是他的这一努力在当时乃至后来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严复主张人道以苦乐为究竟。他说：“人道以苦乐为究竟乎？……应之曰，以苦乐为究竟。”（《天演论》新语按语）严复由此提出“乐者为善，苦者为恶”的价值标准，为其倡导的功利主义提供了自然人性论的基础。

^① 卢云昆编选：《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页。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